

## 第二章、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台灣縣市長選舉是否出現經濟投票現象，即檢驗地方首長選舉發生政黨輪替與否和經濟表現有無關連。故在進行實證研究前，有必要先行理解經濟投票理論及現有之研究成果。於是，本章遂先介紹經濟投票理論的定義及內涵，再對國內外研究經濟投票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整理。

### 第一節、經濟投票理論

根據 Lewis-Beck (1988) 的研究，所謂傳統經濟投票理論 (traditional economic voting theory) 的命題如下：「當選民認同 (不認同) 過去的經濟表現時，他們會投票支持 (反對) 執政黨。」由於上述命題的精確意涵仍有待釐清，故以下將深入探討經濟投票的測量方式、經濟標的、以及衡量的時間座標。

#### 一、經濟投票的測量方式和經濟標的

經濟投票的測量方式可分為兩大類，分別從個體及總體層面來觀察。前者可區分為荷包假設 (Pocketbook Hypothesis) 及社會經濟假設 (Sociotropic Hypothesis)。後者則從政治景氣循環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以下簡稱 PBC) 或總體經濟指標與選舉間的變動關係來討論。<sup>10</sup>

---

<sup>10</sup> 所謂的「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簡稱 PBC), 主要著重於選舉週期與經濟波動間的關係, 即探討執政黨為了贏得選舉, 如何於選前營造經濟榮景, 以增進選民對其能力之肯定。然而, 實際上,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的實證結果頗為分歧。黃上紡 (1996) 指出政治景氣循環的發生, 須通過以下層層關卡: 第一, 執政黨在選前必須有操控經濟的動機; 第二, 必須克服從政策實施到發揮政策效果的政策延遲及時間延遲問題; 第三, 必須避免政策被理性預期而造成政策失靈。此外, Schultz (1995)、Carlsen (1997) 及 Price (1998) 等學者提出的「政治安全度」(political security), 以及 Lächler (1982)、Hecklman and Berument (1998) 所探討的內生性問題 (a problem of endogeneity), 亦會影響政治景氣循環之觀察。故光是觀察經濟變數(如: GNP、失業率、

(一) 個體層面—「荷包假設」和「社會經濟假設」

荷包假設與社會經濟假設皆以個體的調查訪問資料為研究對象，不過兩者評估的標的不同。Kinder and Kiewiet (1981) 指出，荷包假設主張，選民對個人或家庭經濟情況的評估決定選民的投票行為，如果個人覺得自己或家庭的經濟情況有改善便會較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支持在野黨。而社會經濟假設認為，選民對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認知才是主導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鍵因素，即選民認為經濟景氣時，便會支持執政黨；反之，經濟惡化時，便會用選票唾棄執政黨，改投在野黨。

以 Markus (1993) 所舉的例子來補充說明，即可明確瞭解荷包假設與社會經濟假設兩者的差異。假設現在有兩種政策，A 政策擬將收入占前 10% 民眾的所得各提升 10,000 美元，但其餘 90% 人口之所得各減少 1,000 美元，其淨增加即為  $0.1 \times \$10,000 + 0.9 \times (-\$1,000) = +\$100$ 。另一方面，B 政策則將收入占前 10% 民眾的所得各減少 1,000 美元，而其餘 90% 人口之所得各增加 100 美元，則此政策之淨增加為  $0.1 \times (-\$1,000) + 0.9 \times (\$100) = (-\$10)$ 。荷包取向者因 90% 的個人收入會增加的經濟考量而偏好 B 政策；相反地，社會經濟取向者是以國家淨所得的改變（而非個人經濟情況）作為評估標的，故其會支持 A 政策。

---

通貨膨脹、外匯存底等)實質上的表現，常常無法顯著發現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因此，此理論有了最新發展，學者們開始關心是否有「政策循環」(policy cycle) 現象存在。所謂的「政策循環」可分為兩類：一為政治預算循環 (political budget cycle)，觀察指標如政府消費支出、稅收及補貼、優惠貸款、Gini 係數、政府總預算規模、以及文官體系薪資水平等；另一為政治貨幣循環 (political money cycle)，觀察指標如利率、重貼現率、貨幣供給、國內信用、匯率、以及存款準備率等。簡言之，「政策循環」轉而研究執政者是否會為爭取連任而採用選舉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以創造政策利多，增加自身的聲望與支持度。

## (二) 總體層面—「政治景氣循環」和「總體經濟指標與選舉間的變動關係」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著重於選舉週期與經濟波動間的關係，由 Kalecki (1943) 提出，Nordhaus (1975) 將其發揚光大。目前 PBC 已從傳統的「投機性政治景氣循環理論」(opportunistic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簡稱 OPBC 理論) 及「黨派性政治景氣循環理論」(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簡稱 PPBC 理論),<sup>11</sup> 發展至「理性的政治景氣循環理論」(rational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簡稱 RPBC 理論)。<sup>12</sup> 「政治景氣循環」之一般性理論已然建立。

至於總體經濟指標與選舉間變動關係之探討，多從總體經濟指標之變動（多為失業率、物價膨脹率、個人實質可支配所得、經濟成長率等），長期觀察經濟表現與得票率、政黨輪替或政府聲望間的關係。其中，Kramer (1971) 為最先研究總體經濟與選舉間關連的學者，其藉由檢測各種經濟指標對美國 1895 年至 1964 年國會選舉的影響，來建構總體層次投票模型和預測模型。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實質可支配所得與執政黨能否得到選民的支持有正向關係，而失業率及物價膨脹率之波動對選舉結果則無顯著影

---

<sup>11</sup> 投機性模型由 Nordhaus (1975) 所提出。此模型認為執政者為達成連任目的，會於選前對經濟進行操控，塑造出經濟榮景以迎合多數選民的喜好。投機性模型較偏重選舉前時間性的研究，特別是執政黨於選前在經濟政策的動向。黨派性模型則由 Hibbs (1977) 提出。此模型強調不同政黨會因個別意識型態之差異而有不同的經濟政策與經濟路線。其假設右翼政黨執政時，偏好以較高的失業率換取低物價膨脹率；左翼政黨執政時則恰好相反，偏好以較高之物價膨脹率換取低失業率。因此，該模型注重選後經濟路線走向，而較不在乎選民需求。

<sup>12</sup> 1980 年代中期，由於理性預期概念的提出，一些學者開始質疑 Nordhaus 與 Hibbs 視人民為短視 (myopic)、回顧型 (backward-looking) 及適應性預期 (adaptive expectation) 之論點，而形成「理性的政治景氣循環理論」。此理論假設選民為前瞻型 (forward-looking)，具理性預期能力，能對政府在選前為營造經濟榮景而採行的擴張性政策完全預期，使執政黨的如意算盤無法如願以償。但 Rogoff and Sibert (1988) 認為即便如此，政府仍會在選前利用短期資訊不對等影響公共財的決定過程，產生所謂的「理性的投機性政治景氣循環理論」；另外，Alesina (1987) 發現，即使選民有理性預期能力，一旦選舉結果和預期相反，仍會導致總體經濟產生短暫波動現象，此即為「理性的黨派性政治景氣循環理論」。

響，故個人實質可支配所得為較具有解釋力及預測力的經濟指標。

### (三) 個體測量與總體測量之比較

以個體層面或總體層面來觀測經濟投票各有利弊。後者雖如 Markus (1993) 所指，無法區別荷包投票和社會經濟投票，但 Tsai (2000) 認為，總體資料之優點在於可反應實際上經濟情況的改變，而可以之作為個人經濟認知的基礎。而個體調查的研究方式則可明確察覺經濟表現如何影響投票行為。瞭解個別選民之抉擇，是依據國家整體經濟抑或個人荷包？選民對政府或政黨的評估是根據其過去之表現抑或其所提出的政見承諾？選民的投票抉擇是以經濟為首要考量抑或還有其他因素？然而，依據 Markus (1993) 之整理，個體資料存有以下缺點：第一，個體調查幾乎是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的資料，因而無法描述短暫經濟情況改變對投票之影響。第二，如 Kramer (1983) 所言，選民僅會將政府引起的經濟改變反應在選票上，但個體調查僅能測量出經濟標的的整體改變，而忽略了這些改變的起源。第三，調查資料常有測量誤差。

由於本文的目的，在於初探台灣 1989 年至 2001 年 21 縣市之地方首長選舉，是否有經濟投票現象。個體調查資料除有上述缺點外，實際資料之蒐集也極為不易，故本文採用總體的測量方式較為適當。至於總體層次中的「政治景氣循環理論」，Tsai (2000) 指出，PBC 得出的結果相當混雜，經濟表現並非單獨為政府努力下的產物，而是市場操作、政府和國際經濟體系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故本文亦不從政治景氣循環的角度切入，轉而聚焦於總體經濟情況對選舉的影響。然值得注意的是，Kramer (1983) 強調，總體資料雖可支持選舉結果受經濟因素影響的假設，但卻無法對選民投票之依據提供太多的解釋。故本文必須避免根據實證結果，而對選民個人投

票行為進行過度推論，以免落入「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sup>13</sup>

## 二、衡量的時間座標—回顧性投票 (retrospective voting)、前瞻型投票 (prospective voting)

### (一) 回顧型投票

所謂的回顧型投票，意指選民根據具體事實作為投票依據而非憑空想像。換言之，執政黨過去的表現，成為選舉投票時的參考依據以及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變數。如 Key (1966) 主張，選民會回顧其已知的「事實」來獎懲現任者，而不太會根據未知的承諾來投票。Fiorina (1981) 認為選民會對執政者過去的表現加以評價，並假設換做是其他政黨會如何處理，最後經由選票予以獎懲。當選民肯定現任政府時便會支持之；若希望有不同表現時，則會反對之。回顧型投票行為研究多沿襲自 Kramer (1971)，經濟評估、或國家、社會的重大事件皆可作為回顧型投票之觀察標的。

就經濟投票研究而言，根據傳統經濟投票理論，選民投票之依據是評估執政黨過去的經濟表現，而非未來的政策計畫。因此，倘若選民認為經濟變差，便會投票給在野黨，藉以表達心中對執政黨之不滿；反之，便會繼續支持執政黨。

### (二) 前瞻型投票

另一相異的投票理論主張選民的投票行為為前瞻型 (look forward) 而非回顧型 (look backward)。此意謂選民依據執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承諾來投票。Downs (1957) 認為，選民為減少未來表現資訊的蒐集成本，會採用評估政黨或候選人過去表現的方式來預測其將來的政績，並對各競爭政黨的預期未來表現進行比較，最後選擇可極大化其個人報酬 (payoff)

---

<sup>13</sup> 生態謬誤為將總體層次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推論至個體層次上所產生的錯誤。

的對象。依此看來，Downs 雖然相當重視回顧型投票，但選民極大化“未來”福利的作為才是其論點之核心。Achen (1992) 亦認同 Downs 的看法，主張選民對政黨或候選人進行的回顧性評估，僅是工具性 (instrumental) 和中介 (intermediate) 步驟，用以提供預測不同政黨或候選人可能表現之必要資訊，而非選民最終投票決定的依據。

### (三) 回顧型投票與前瞻型投票之比較

無論是回顧型投票或是前瞻型投票，其實皆符合 Downs (1957) 對選民投票行為所提出的基本假設：即選民均是理性的，其會將選票投給能帶給自身最大效用的政黨。至於回顧型投票與前瞻型投票間的關係，多數學者認為後者奠基於前者之上，執政黨過去的政績、甚至是媒體對過去表現的報導等，都會影響選民的前瞻型評估，因而左右其最後的投票抉擇。但無論如何，就經濟投票而言，選民越瞭解過去與未來的經濟狀況，越有可能出現經濟投票行為來獎懲執政黨。

如前所述，本文著重於總體層面中，總體經濟情況對選舉影響的探討。除此之外，本研究預計檢測執政黨過去的經濟表現，是否與縣市長選舉發生政黨輪替有關，因此，本文屬於「回顧型投票」的應用。

## 第二節、地方首長選舉與經濟投票之相關國外文獻

自 1970 年代，Kramer (1971) 提出經濟投票理論，發現經濟情況對選舉的衝擊之後，學者業已發展出一些模型去解釋或預測選舉結果。儘管學者們對於究竟哪一個經濟指標最具解釋力有所爭論，例如：Nordhaus (1975)、Hibbs (1979) 認為失業率高時易造成人心恐慌，且失業者切身之痛也會波及至其親友，故失業率對選舉結果的影響較為顯著；Kernell (1978)、Mackuen (1983) 則主張物價膨脹所造成的損失全民皆感同身受，因此物價膨脹率比較重要。但在總統及國會等中央層級選舉方面，Kramer (1971)、Bloom and Price (1975)、Weatherford (1978)、Kinder and Kiewiet (1981)、Hibbing and Alford (1981) 以及 Lewis-Beck and Rice (1992) 等皆已證實，經濟表現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相當強烈。即當美國國內景氣不佳時，會有害於一個無法促進國內經濟成長的無能總統（或政黨）繼續執政，進而出現政黨輪替現象。

此外，Lafay (1985)、Kirchassner (1985)、Lewis-Beck (1988) 等亦發現，法國、德國、英國等民主國家執政黨的選舉命運也同樣繫於國內經濟表現。除了西方先進國家外，Wu (2001) 針對波蘭、捷克及匈牙利三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國會選舉進行研究，發現此三個中東歐國家在 1990 年代時皆出現經濟投票現象，並因此導致不間斷地政黨輪替。Molina (2001) 更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等非工業化國家，與先進工業國家共 328 次的戰後民主選舉做綜合比較。在將選舉結果發生政黨輪替者標記為“1”、反之為“0”之虛擬變數作為應變數後，研究結果發現非工業化的經濟結構加上國內的經濟危機，<sup>14</sup>是致使非工業化國家政黨輪替之現象，較先進工業國

---

<sup>14</sup> Radcliff (1992) 指出，非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危機會使投票率增加，並直接導致執政黨下台。換句話說，選舉參與率提升，執政黨替換的頻率便越頻繁。但吊詭的是，Pacek 和 Radcliff (1995) 發現，假使新政府克服了經濟危機，出現了相對經濟榮景，下一次

家頻繁的重要因素。

全國經濟對總統及國會選舉的影響一如上述文獻，已有相當一致性的結果。即選民會於中央層級選舉中，用選票唾棄經濟表現不佳的執政政黨；全國經濟惡化的確不利於在位者連任之路，並與政黨輪替之結果息息相關。但是，地方經濟對於地方選舉是否造成影響的實證結果卻十分分歧。Kenny (1983) 以回顧型經濟性投票 (economic retrospective voting) 來探討美國州長選舉，發現地方的經濟情況並不會影響州長的選舉結果。即州長不用對一州經濟表現的優劣負政治責任，州之經濟表現與州長 (或地方執政政黨) 是否能繼續執政並無顯著相關。Chubb (1988) 針對 1940 年至 1982 年間的美國州長選舉進行實證研究，得出地方首長選舉深受全國經濟表現，及總統應對其負起之責任所影響。相較而言，州經濟狀況及州長對其之貢獻，反而不那麼重要。Stein (1990) 以荷包投票來研究 1982 年之州長選舉。結果指出，州選民不會將一州經濟表現之好壞歸責於州長，那些責任反而會先落在總統的肩上，此即為「功能性責任」(functional responsibility)。故選民會參酌全國經濟表現，獎賞或懲罰與總統同黨 (in-party) 的現任州長或其接班人。Tidmarch et al. (1984) 透過觀察美國國會及州長選舉活動的相關新聞議題則發現，競選議題會隨者不同層級的選舉而有所差異。譬如，在全國性選舉中有主導地位的經濟議題較少在地方選舉中出現，而教育、犯罪、就業、稅務.....等州長主掌的領域，才是州長選舉中選民主要關切的項目。

以上列舉之文獻皆主張，州長選舉中缺乏經濟性投票的證據。但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地方經濟表現是主導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Partin (1995) 在對 1990 年美國 36 州的選舉研究中發現，雖然州長間的開放性

---

選舉時，那些原先對經濟情況不滿的選民便喪失了投票的動機與誘因。結果，新政府失去其選民支持，導致被在野黨取代的可能性提升。總歸而言，持續地經濟危機會促使政黨輪替的情況頻頻發生。



競爭 (open races) 會受外來變數之影響 (如：全國經濟表現、總統受歡迎的程度等)，<sup>15</sup>但州選民對地方經濟的回顧型評估才是現任州長 (或地方執政政黨) 連任與否的關鍵因素。Leyden and Borrelli (1994) 運用 1972 年至 1991 年美國 43 州的選舉資料，來分析州經濟情況對州長選舉的影響，其認為由於單一政府 (a united government) 較分裂政府 (a divided government) 易於追究責任，任何缺失皆無可推託。故當州長及州議會被同一政黨掌控時，州的經濟表現會影響州長的選舉結果。其中，州的失業率與執政黨得票率尤其有嚴重的負相關。簡而言之，地方經濟表現不佳，加上單一政府之組成型態，會提升地方首長政黨輪替的機率。Bowler and Donovan (1994) 研究 1974 年至 1992 年加州州長選舉則證實，當加州經濟表現停滯時，即使選民處於缺乏資訊的劣勢地位，理性的選民還是會去追究，到底是聯邦政府抑或加州政府應為經濟不景氣負起責任。如果選民認為是州政府政策失當的結果，便會透過否定投票行為來撤換無能的州長或政黨。

最後，將上述研究地方首長選舉與經濟投票的國外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1。

---

<sup>15</sup> 現任州長任期屆滿，原執政黨需推其他人參與選舉之情況，稱為開放性競爭。

表 1: 地方首長選舉與經濟投票的相關國外文獻整理

地方經濟與州長選舉結果無關

文獻	研究對象	主要研究發現
Kenny (1983)	1946—1980 年美國 14 州州長選舉	地方的經濟情況並不會影響州長的選舉結果，即州長不用對一州經濟表現的優劣負政治責任。
Tidmarch et al. (1984)	1982 年美國國會和 州長選舉	競選議題會隨者不同層級的選舉而有所差異。在全國性選舉中有主導地位的經濟議題較少在地方選舉中出現。
Chubb (1988)	1940—1982 年美國 45 州州長選舉	地方首長選舉深受全國經濟表現所影響。州經濟狀況及州長對其之貢獻，反而不那麼重要。
Stein (1990)	1982 年美國 16 州 州長及參議員選舉	州選民不會將一州經濟表現之好壞歸責於州長，反而會參酌全國經濟表現，獎懲與總統同黨的現任州長或其接班人。

地方經濟與州長選舉結果顯著相關

Leyden and Borrelli (1994)	1972—1991 年美國 43 州州長選舉	地方經濟表現不佳，加上單一政府之組成型態，會提升地方首長政黨輪替的機率。
Bowler and onovan (1994)	1974—1992 年加州 州長選舉	當加州經濟表現停滯時，理性的選民會去追究責任。如果選民認為是州政府政策失當的結果，便會透過否定投票行為來撤換無能的州長或政黨。
Partin (1995)	1990 年美國 36 州 州長選舉	雖然州長間的開放性競爭會受外來變數之影響，但州選民對地方經濟的回顧型評估才是現任州長（或地方執政政黨）連任與否的關鍵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依文獻時間順序排列。

### 第三節、台灣經濟投票之相關文獻

根據上節所述，國外關於經濟投票的研究，不論是針對西方先進民主國家、或是東歐與拉丁美洲等民主轉型中國家，都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出現。反觀台灣，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雖然也為數不少，但在分析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時，多半集中於政黨認同、統獨議題、族群省籍、候選人評價、策略性投票等，<sup>16</sup>對於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經濟投票行為之研究，卻是少之又少。僅有黃秀端（1994）、Hsieh et al.（1996、1998）、王柏燿（2002）等少數學者，以台灣選舉為研究對象（多半是中央層級選舉），對選民評估經濟情況（包括對國家總體經濟情況及對個人經濟情況的評估）與選舉間之關連進行實證分析。

其中，黃秀端（1994）研究第2屆台北縣立委選舉時發現，選民對國家整體經濟的看法、以及個人自身經濟狀況的評估，皆與黨派抉擇呈現顯著相關。然相關係數並不高，當加入其他因素時，經濟影響力便會消失。因此，經濟問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不如統獨問題及國家認同等象徵性議題來得重要。作者認為箇中原因可能與國、民兩黨於經濟問題的態度並不明顯、以及選民不認為經濟問題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關。

Hsieh et al.（1996）對台灣1994年舉行之選舉進行經濟投票研究，結果發現，經濟議題與台灣獨立和國家安全議題一樣重要。台灣的選民並非單一議題投票者，其會針對經濟表現及候選人承諾進行評估。但作者發覺，在台北市長選舉中，選民對經濟的評估會因候選人而有所差別，這是傳統經濟投票理論未提及的問題。Hsieh et al.（1998）對1996年總統選舉的研究結果則證實，政黨認同仍是選民投票的重要依據，但前瞻型的經濟

---

<sup>16</sup> 可參見黃秀端（1996）、陳陸輝（1998）、盛治仁（2000）、簡鈺肆（2003）等。

評估亦為決定選票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雖然此次總統選舉中，回顧型的經濟變項並未達顯著水準，但因為台灣過去由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生態，使選民有足夠的機會去評估其執政表現，故台灣非常適合進行回顧型投票之研究。

王柏燿（2002）針對 1996 年總統大選進行多項對數成敗比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同樣得出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至於 2000 年之總統大選，可能由於外在因素的干擾、選民的認知差異、或是候選人因素的影響，使得該年選舉的調查結果，經濟評估的影響並不顯著。但若將經濟不景氣歸責於國際環境因素的選民從研究對象中剔除，則可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確實存在。有關台灣研究經濟投票的文獻整理於下表 2。

上述列舉之國內少數針對經濟投票行為之研究，多半侷限於中央層級選舉的探討。但無論是總統大選抑或立委選舉，皆僅有一次政黨輪替經驗，<sup>17</sup>若對其進行全國經濟表現不佳是否會使執政黨遭致替換的檢驗，實有樣本數過少之疑慮。而台灣地方首長選舉，政黨輪替的經驗相當豐富，然目前多用派系、施政滿意度等面向來解釋，<sup>18</sup>有關經濟情況是否會影響選舉結果而致使政黨輪替之研究，卻是付之闕如。故本文擬率先嘗試，以台灣 21 縣市之首長選舉做為研究對象，探究縣市長級的地方選舉結果是否符合經濟投票理論的假設，即執政黨失去統治者地位是否與其經濟表現不佳有關。<sup>19</sup>

---

<sup>17</sup> 2000 年第 10 屆總統大選由民進黨獲勝，結束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局面，台灣中央政府首次出現政黨輪替。2001 年第 5 屆立委選舉，民進黨首次贏得多數席次，成為立院中的最大黨。

<sup>18</sup> 可參考黃國敏（2001）、韓秀珍（2002）。

<sup>19</sup> 國外有關地方選舉之文獻，多半以得票率、以及投票給執政黨抑或在野黨之虛擬變數作為應變數。本文為進一步探討致使縣市長選舉出現政黨輪替的因素，故仿效 Molina（2001），將模型中之應變數改為政黨輪替與否之虛擬變數。

表 2: 台灣經濟投票之相關文獻整理

文獻	研究對象	主要研究發現
黃秀端 (1994)	第 2 屆台北縣立委選舉	經濟問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不如統獨問題及國家認同等象徵性議題來得重要。
Hsieh et al. (1996)	1994 年省長選舉、省議員選舉、北高两市市長選舉及北高两市市議員選舉	經濟議題與台灣獨立和國家安全議題一樣重要。台灣的選民並非單一議題投票者，其會針對經濟表現及候選人承諾進行評估。
Hsieh et al. (1998)	1996 年總統選舉	政黨認同仍是選民投票的重要依據，但前瞻型的經濟評估亦為決定選票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柏耀 (2002)	1996、2000 年總統選舉	1996 年總統大選時，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至於 2000 年之總統大選，若將經濟不景氣歸責於國際環境因素的選民從研究對象中剔除，亦可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確實存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依文獻時間順序排列。

## 第四節、本章小結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索台灣 1989 年至 2001 年 21 縣市地方首長之政黨輪替是否與經濟表現有關。此外，本文更將納入政治與其他變數，期望除了以經濟因素做為研究主軸外，也能進行延伸性探索，以挖掘促使地方首長政黨輪替之真相。因此，本章先於第一節對「經濟投票理論」加以說明，再於第二、三節對國內外之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整理，以做為本研究之參考依據。本章內容整理如下：

### 一、經濟投票理論

根據 Lewis-Beck (1988) 的研究，傳統經濟投票理論的命題如下：「當選民認同（不認同）過去的經濟表現時，他們會投票支持（反對）執政黨。」其中，經濟投票的測量方式可自個體及總體層面來觀察。個體層面可區分為荷包假設及社會經濟假設，分別為選民對個人或家庭經濟情況、以及選民對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評估。總體層面則從政治景氣循環、或總體經濟指標與選舉間的變動關係來討論。前者著重於觀測選舉週期與經濟波動間的關係，以經濟指標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觀察標的；而後者則多從總體經濟指標之變動，來觀察經濟表現與得票率、政黨輪替或政府聲望間的相關性。另外，若以時間的衡量座標來區分，經濟投票又分為回顧型投票及前瞻型投票，此二者分別以執政者過去的經濟表現，和執政黨（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承諾做為投票依據。本文則屬於總體經濟情況對選舉影響的探討、以及回顧型投票之應用。

### 二、地方首長選舉與經濟投票之相關國外文獻

有關總統及國會等中央層級選舉之經濟投票研究，Kramer (1971)、Bloom and Price (1975)、Weatherford (1978)、Kinder and Kiewiet (1981)、

Hibbing and Alford (1981)、Lewis-Beck and Rice (1992)、Lafay (1985)、Kirchassner (1985) 及 Lewis-Beck (1988) 等皆已證實，全國經濟表現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相當強烈。相較之下，地方經濟對於地方選舉是否造成影響的實證結果則較為分歧。Kenny(1983)、Chubb(1988)、Stein(1990)、Tidmarch et al.(1984) 等人主張，美國州長選舉中缺乏經濟性投票的證據。但 Partin、(1995)、Leyden and Borrelli (1994)、Bowler and Donovan (1994) 等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地方經濟表現是主導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

### 三、台灣經濟投票之相關文獻

台灣目前有關經濟投票行為之研究為數不多，僅有黃秀端 (1994)、Hsieh et al. (1996、1998)、王柏耀 (2002) 等少數學者，且多半以台灣中央層級選舉做為研究對象。上述的研究結果歸納如下：第一，黃秀端(1994) 研究第 2 屆台北縣立委選舉時發現，經濟問題不如統獨問題及國家認同等象徵性議題來得重要。第二，Hsieh et al. (1996) 研究 1994 年之選舉時發現，經濟議題與台灣獨立和國家安全議題一樣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第三，Hsieh et al. (1998) 研究 1996 年總統選舉，結果證實，前瞻型的經濟評估亦為決定選票的重要依據之一。第四，王柏耀 (2002) 分析 1996 年總統大選，得出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而 2000 年之總統大選，在將經濟不景氣歸責於國際環境因素的選民從研究對象中剔除後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確實存在。

鑑於上述台灣有關經濟投票行為之研究，多半侷限於中央層級選舉的探討。而討論是何因素導致台灣地方首長選舉出現政黨輪替之文獻，又多用派系、施政滿意度等面向來解釋，有關經濟表現是否會致使縣市長遭致輪替之研究，卻是付之闕如。故本文率先嘗試以台灣 21 縣市首長選舉做為研究對象，探究縣市長級的地方選舉是否符合經濟投票理論。